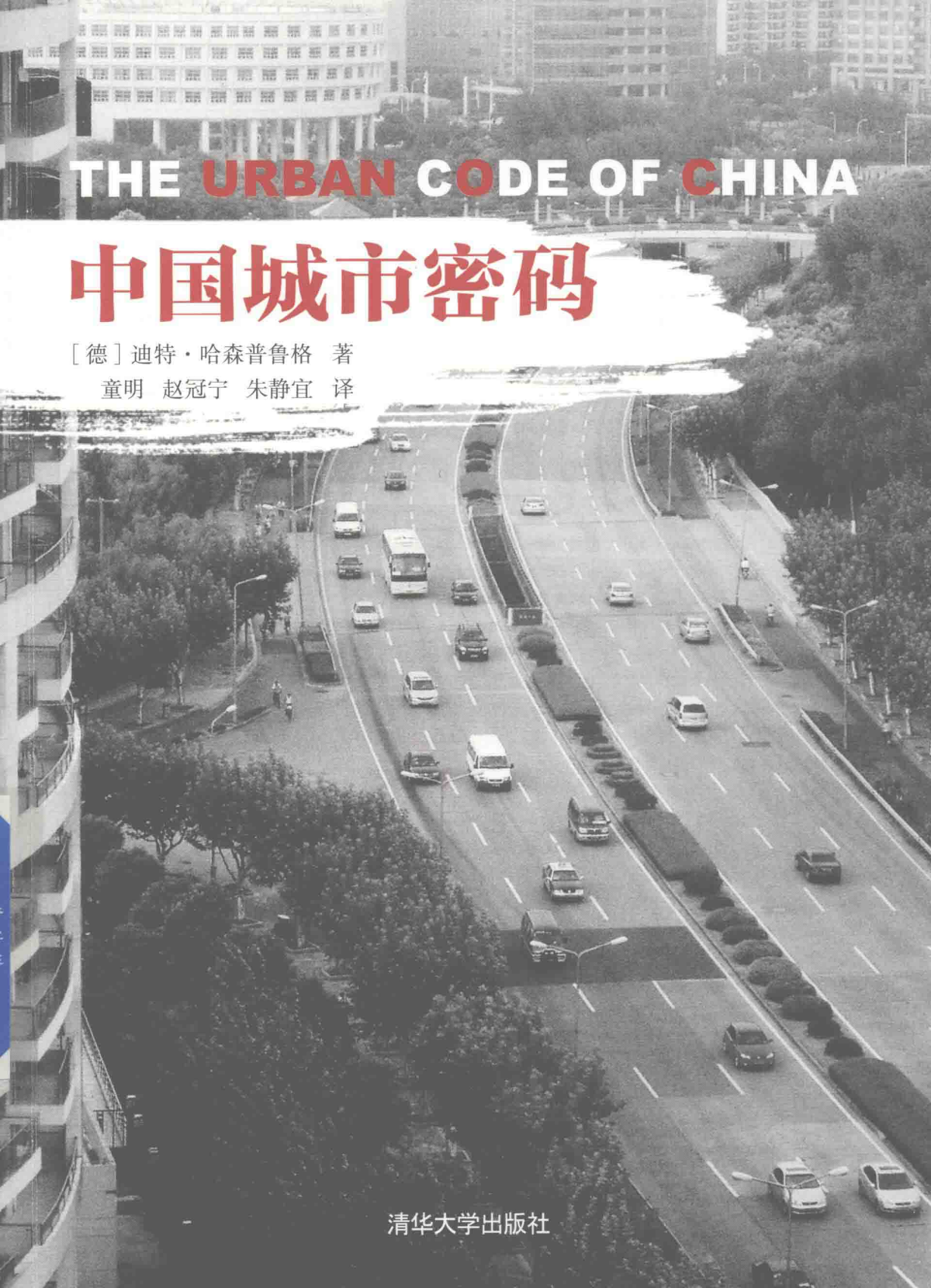




THE **URBAN** CODE OF **CHINA**

中国城市密码

[德] 迪特·哈森普鲁格 著

童明 赵冠宁 朱静宜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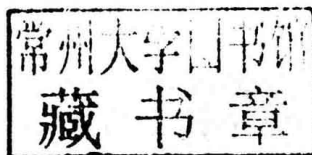
THE URBAN CODE OF CHINA

中国城市密码

DIETER HASSENPFUG

[德] 迪特·哈森普鲁格 著

童明 赵冠宁 朱静宜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京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1-7424

Hassenpflug, Dieter: Der urbane Code Chinas

© Birkhäuser Verlag GmbH, Basel.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work may not be translated or copied in whole or part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Walter De Gruyter GmbH, Genthiner Straße 13, 10785 Berlin, Germany)

Translation from English into Chinese by Tong Ming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城市密码 / (德) 迪特·哈森普鲁格著; 童明, 赵冠宁, 朱静宜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ISBN 978-7-302-49135-4

I. ①中… II. ①迪… ②童… ③赵… ④朱…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中国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5330 号

责任编辑：徐 颖

装帧设计：孙 璐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杨 艳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 A 座 邮 编：100084

社 总 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量反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30mm 印 张：21.75 字 数：179 千字

版 次：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89.00 元

产品编号：045039-01

· 中文版前言 ·

能够将《中国城市密码》付梓并呈现给诸位是我的莫大荣幸。中国读者可以借此中文版本，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和文字，来反观我这个来自德国的城市研究学者，是如何观察、描述和解释他们自己的城市是怎样发展的。

我坚信，一种来自他国异域文明的客观视角，对于理解自己的文化与社会是一把不可或缺的钥匙。相应地，撰写本书的初衷也是为欧洲或者西方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自己的城市建设机制。因此，本书的写作从头至尾，都很自然地采用了一种对比的视角。欧洲城市发展的经验就有点像医疗诊断造影技术中的显影剂：它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去辨识中国城市的轮廓，然后以更高的清晰度将它们重新描绘出来。

与此同时，这种“外部视角”所导向的则是内部世界。正因如此，这一视角同样也会吸引中国读者。借助于这个“外部视角”，他们可以获得令人惊奇的发现。对于本书的读者而言，那些平时不曾留意或者简单接受的城市空间事实，由于被习以为常地当作城市生活环境的普遍前提，从而失却了它们未经详查的深刻含义，即“城市原本性”。突然间，这些城市空间事实会揭示自身：它们就是充满社会文化烙印的中式实践的空间呈现。以前我经常问学生，为什么总是将居住区设计成内向和封闭的，他们往往都这样回答：“不

就是这样设计的吗？”甚至许多中国的知名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都深感惊讶，封闭住区的开发行为可以作为一种科学研究议题。

本书遵循这样一种理念：中国近年来的城市化进程不完全是受到西方模式引导的现代化产物，它同时也是深植于中国数千年历史的社会与文化动力的一种表达。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浸透着诸多传统元素，如果不能识别它们的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中国城市。如此之下，我们就难免得出错误的观点，继而做出糟糕的城市规划。

秉持以上诸多观点，本书同时也着力展现城市符号学（urban semiotics）¹所具有的、一种科学与知识导向的潜质。这里所采用的符号学方法是基于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²的符号学、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³的记号学，以及艾柯（Umberto Eco）⁴的建筑符号学⁵的观点。为了能够在城市开发的尺度上采用符号学方式来呈现城市空间，该方法还融合了结构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以帮助解释“社会”（Gesellschaft）与“社区”（Gemeinschaft）⁶的二元密码。因此，本书也涉及到社会学的维度。本书将城市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学文本来进行“阅读”或者破解，它们只不过是用柏油、石块、玻璃和混凝土来书写罢了。

本书原先的德语版本是以 *Der Urbane Code Chinas* 为名，2008 年冬天出版，随后便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些关注不仅来自建筑学、城市设计或城市规划等学科领域，以及诸多的国际性建筑期刊，而且也来自更加广泛的社会公众。于是，本书几乎被所有德语国家的重要报刊争相报道，并且作为有关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的专门议题进行讨论。由于许多西方专业人士将蒸蒸日上的强大中国视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圣地”，甚至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他们将“中国城市密码”作为极受欢迎的信息索引。因此，本书德语版在修订和完善后于 2013 年进行再版也就自然而然了。

各位读者手中的这一中文版以由马克·卡默鲍尔（Mark Kammerbauer）翻译的英文版 *The Urban Code of China* 为基础。英译本于 2010 年出版。

我曾经到访中国多次，并在许多高校进行访学，本书则是自 2002 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也去过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它们基本上都位于中国的东部和北部。例如北京、上海、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大连、青岛、郑州、西安、宁波、长沙、深圳、香港、澳门、中山、广州、徐州等。其中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经历则是，有不少大学邀请我担任客

座教授，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沈阳建筑大学、青岛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等。其中尤其与同济大学有着特殊渊源，这是因为魏玛包豪斯大学与同济大学合作成立并设立的“国际城市综合研究(IIUS)”的双学位项目，而我本人则创建了这一项目的负责机构“欧洲城市研究所(IFEU)”，并担任所主任直至2006年。

我同时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愿意将本书带到中国。感谢我在中国所有的同事和朋友们，他们以各种方式为这本《中国城市密码》能够在其原生地得以出版提供帮助。同时还需特别感谢童明教授，他承担了将本书翻译成中文的艰巨工作。

迪特·哈森普鲁格

2014年7月27日于魏玛

>>>>

本书注释分为两类：作者对其文章的补充说明以红色编码标注，统一附于书末；译者为方便读者阅读，对文中出现的一些人物、事件及专有名词进行了解释，以黑色编码标注，附于书页下方。

¹ Semiotics (符号学) 是对符号的含义进行解释或研究记号体系功能的科学，19世纪末由美国哲学家皮尔斯从逻辑学角度提出，后经美国逻辑学家莫里斯(C. W. Morris)等进一步发展。在英语世界尤其是美国，人们出于对皮尔斯的尊敬，一般采用 Semiotics。Semiology (记号学) 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1915)

中提出的，为罗兰·巴特等欧陆理论家继承发展，代表了符号学发展的语言学脉络，他们出于对索绪尔的尊敬一般使用该词原文为 semiotics，是对记号的含义进行解释或研究记号体系功能的科学，由皮尔斯创立。后文的“记号学”原文为 semiology，由索绪尔创立，但经常与 semiotics 混用。索绪尔将皮尔斯的符号学扩展到社会科学领域，代表了符号学发展的语言学脉络一路。两个术语之间存有微妙的差异，二者的区别在于，索绪尔的符号学是二元的（能指符号/所指信号），而皮尔斯的符号学是三元的（符号/对象/解释项）；同时，皮尔斯的符号学不仅解释了外在的意义传达机制，还解释了内在的再现机制。两个术语有微妙的差异，但一般认为，皮尔斯的 semiotics 代表的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传统，而索绪尔的 semiology 代表的是欧陆的传统。为了表示区分，本书中将 Semiotics 译为符号学，而将 Semiology 译为记号学，以示区分。——译注

² 查尔斯·S·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逻辑学家，数学、研究方法论、科学哲学、知识论和形而上学领域中的改革者。他主要对形式逻辑的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他的“逻辑”所涵盖的很多内容现在被称作科学哲学和知识论。他发现并创建了作为记号语义学分支的逻辑学。——译注

³ 菲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瑞士语言学家，祖籍法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他把语言学塑造成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将语言理解为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译注

⁴ 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1932—），意大利哲学家、符号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和小说家，其作品除随笔、杂文和小说外，还有大量论文、论著和编著，包括中世纪神学研究、美学研究、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符号学研究和阐释学研究等。——译注

⁵ 建筑符号学是符号学在建筑学领域中的应用，意味着在符号学意义上，建筑的外观、材料、用途等都是从各自的使用功能中抽象出来，获得了非建筑学的文化意义，从而形成了一种类似语言符号系统的意指系统。建筑元素依照意义生成的规则相互组合，向人们传递视觉信息。建筑符号的意指系统由诸多建筑元素的集合和建筑规则所组成的代码构成，符号通过建筑代码生成意义。——译注

⁶ 德语中 Gesellschaft 和 Gemeinschaft 之间有着微妙的区别，仅用“社会”与“社区”并不能进行很好的区分，但其中的差异之处更加深刻。Gesellschaft 是指理性社会或法理社会，Gemeinschaft 则是指人情社会或礼俗社会。具体的阐释见作者在第8章的阐述。——译注

· 译者序 ·

互联网、肥皂剧、进口片；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库哈斯、福斯特、哈迪德；高档汽车、极速高铁、欧陆风情……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给人留下的印象，除了令人瞠目的疯狂速度与前所未见的普及范围之外，就是饱受诟病的全盘西化，这不仅是每一个前来观光的“老外”所获得的直观感受，国人或许更加愿意信以为真。

只是这种巨变所带来的并不全是欢欣鼓舞，人们的内心深处总是落有一丝隐约的焦虑不安。在一个传统中国城市正全面消逝的背景中，兴起的或是令人心潮澎湃的现代城市，或是令人痛恨有加的另类城市，当代中国城市不仅正在偏离原有的轨道，甚至有点迷失了方向。

德国城市社会学者迪特·哈森普鲁格（Dieter Hassenpflug）教授却并不这样认为。凭借游历中国多年的经验，在大量获得新鲜而有趣的体验之余，他用德国人特有的批判精神不断地进行梳理和整形，并花费数年时间撰写了这本《中国城市密码》（*The Urban Code of China*）。

在书中他劈头就问：中国城市当真在采用西方的样板吗？这种遵循的力度究竟有多大？他用两个极为日常的现象进行了质疑：必胜客在中国分店所提供的菜谱与在西方国家有着很大差别；而中国生产的奥迪与帕萨特则在欧洲尺寸基

础上加长了 10 厘米，以迎合这个新兴大国汽车消费者的虚荣心态。因此，哈森普鲁格有理由认为，尽管中国城市表面上正在逐渐褪去原有的面貌，但骨子里仍然还是存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他的结论就是，中国城市根本就没有在全盘西化，事实上，“硕大、饥渴的中国在用其文化方面的创新能量消化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养料，中国并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拿来，而是进行改造，为己所用”。

哈森普鲁格是一名来自德国魏玛包豪斯大学的教授，曾经创办并担任欧洲城市研究所主任，目前他也是杜伊斯堡艾森大学的访问教授，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城市理论、欧洲城市发展史、后工业时代空间生产、公共空间等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位深度研究中国城市问题的学者。

哈森普鲁格自 2000 年起就频繁地接触中国的城市发展，起先作为受邀学者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从事多年的教学访问，这也使他有机缘与更多的中国高校进行深入研究，走访众多的中国城市，也随之介入一些实践性的研究课题和具体的城市决策过程，因此哈森普鲁格对于中国的城市发展有了来自各种层面的理解，而这本《中国城市密码》就是将近 7 年旅程的一个总结。

在书中，哈森普鲁格大量呈现了西方观察者在城市游历时所获得的那种新鲜、陌生、奇异的感受。作为一名来自秩序之乡德国的学者，他所列举的许多现象尽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往往也会随之噗哧一笑：在炎炎夏季穿着轻薄睡衣游荡于城市街头的上海人；拴绕于街边树木、灯柱、围墙之间随处飘扬的晾衣绳和“万国旗”；为了避让交通拥堵而在哈尔滨人行道上横冲直撞的出租车……

然而哈森普鲁格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城市观光客，每一个捕捉到的镜头对他而言都蕴藏着耐人寻味的深层含义，而其中被施以最多论述的，则是公共空间在中西方城市里的不同际遇。

按照欧洲人的眼光，哈森普鲁格注意到，在中国城市里，理应属于公共空间的街边空地或者人行道可能会被占用为私人的客厅、卧室、厨房，以及排档店、修车摊，人们待之就如自家后院，而毋须在意行为举止和必要的社会礼节；在属于私有空间的住宅楼道里，却可能寄居着办公室、商务房、理发店、婚纱棚……

这既是一种西方视角的镜头捕捉，同时也是哈森普鲁格想揭示的、源自中国传统的城市特征。他认为，就传统意义而言，公共空间在欧洲城市意味着人们相遇、会面、交流的

场所，意味着市民性与民主性，是城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公共空间在中国城市中时常缺乏相应的表达，它们要么表现为硕大无度、空荡乏味的权贵空间，要么表现为不修边幅、残破局促的街角绿地，这也是中国城市在“开放空间”与“公共空间”之间经常概念不清的一种自然结果。

大量的中国城市热衷于花费巨资来建造大型公共项目或者巨幅市政广场，但往往对于城市的公共生活收效甚微，被哈森普鲁格称为“线型中心”（Linear Centrality）的城市主轴则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现象。这类源自北京或者其他传统城市的统领性轴线汇聚着城市重要节点，极其广泛地应用于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中，并被冠以“一轴两翼”“都市走廊”之类的名称，却经常由于缺乏足够的城市背景支撑，而在显贵的表面形式与贫乏的实质内容之间苦苦挣扎。

于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市民广场可能要么封闭不易进入，要么尺度虚大或氛围凝重而不宜停留。与之相对应的是，散落于城市各处的市民活动却难觅良所，就如书中照片所呈现的，打牌下棋、夜舞健身，这些“不上台面”的行为经常会蜷缩在城市高架路局促、阴暗的角落里。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就不能踏踏实实地考虑普通老百姓的公共生活？为什么中国的市民就不能认认真真地对待他们所

共有的城市环境？哈森普鲁格似乎在揭示，中国城市空间的“二元密码”是由“开放”与“封闭”所构成的，而非如同欧洲城市那样是由“公共”与“私有”所构成。公共空间已由权贵化、商业化的开放空间所替代，而真正承载市民生活的场所却经常被忽略不计，难以体面。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城市给人的印象也是公众将城市空间公为私用，日常的一举一动都在此展开，“私人”和“公众”的界限在这里消失了。正是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现代化进展迅速的大都会，很多场所被居住者富有想象力地利用起来，尤其是那些在拆除与新建的夹缝中、在传统与现代的并行中存在的中间地带。

哈森普鲁格的观察同时揭示着中国城市中许多公众和私人界限不明、空间与内涵相互错位的现象。例如城市绿化，本该用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但是对于绿化率贡献最大的，要么是公路两侧的绿化隔离带，要么是一般百姓难以接近的高尔夫球场、大学校园、高级宾馆、高档社区等，即便是城市公园，进出还需收费。如上海浦东的世纪公园就令哈森普鲁格深感难以理解，30元的门票将大量的晨跑者、骑车者排斥在外，此等做法何以胜任“浦东绿肺”之称？

哈森普鲁格引用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 和马克斯·韦伯 (Max Webber) 的观点, 采用“社会” (Gesellschaft) 与“共同体” (Gemeinschaft) 这一对概念来解释中西方城市空间差异的深层原因, 认为中国城市之所以缺乏西方城市那种性质的公共空间, 或者公共空间在中国社会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其本质原因是中国社会结构所存有的一种抹之不去的乡村特征。即便在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现代大都会中, 在拆除与新建的夹缝中, 在传统与现代的并置中, 仍然并存着很多来自乡村集体生活的传统痕迹, 在这样一种共同体式的环境里, 公共与私有仍然混为一体。

除了中国特色的城市景象外, 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也引起哈森普鲁格的极大关注。尽管来自于现代主义建筑重要起源地的包豪斯, 哈森普鲁格却在书中发出这样的感慨: 《雅典宪章》虽然酝酿于欧洲, 却不折不扣地落实于中国,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一样, 在城市中如此大规模地推广工业化制造的住宅。

在这一令人震撼的工业化城市壮景中, 哈森普鲁格尤其关注“居住小区”这一别具中国特色的规划形式, 并将居住小区的组织方式与一种乡村式的集体社会联系到一起, 相对于欧洲城市的居住空间, 中国的居住小区往往表现为尺度巨大的超级街区, 其格局对外是排他的、封闭的, 对内则是同

质的、向心的。围墙栅栏、卷帘闸门、摄像机头、保安门卫、通行关卡经常令人感到警戒森严，并将城市空间的连续性层层切断。

然而这样的居住小区又与哈森普鲁格在美国所广泛见到的“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有所不同。那是在一个充满社会极化、种族张力的环境中所本能采取的一种防卫措施，而中国居住小区的院墙体系却更可能传承于历史中的围合城市，同时也能将社会性与功能性融合于一体，在一个封闭的居住小区内部，往往集中着可以供给的一切：食品、医疗、零售、教育和学校，甚至还有与之相应的管理系统——居民委员会。

与居住小区形制相对应的则是小区中央的公共绿地，哈森普鲁格将它与传统四合院里的庭院联系到一起，在那里，各个居室围绕着作为开放空间的庭院来建造。而开放庭院对于大家庭的意义就如同今天公共绿地对于集体居民的意义，不同之处就在于小区绿地同时又遵循着城市公园的方式，遍布着奢华飘逸的喷泉、异域风情的凉亭、怪石林立的池塘、悄然流淌的音乐、五颜六色的灌木丛……然而，这种公园理论上只供小区内部居民独用，并不针对外部城市环境开放，于是，哈森普鲁格将这样一种内部公园与集体社区的布局方

式描述为“都市村庄”，有别于欧洲由市民社会所构成的那种自由、开放的城市空间。

另外，哈森普鲁格在书中还通过对中国传统城市的研究来追踪当前中国的另一些城市密码，例如中国传统的风水观念、社会等级制度与天经地义的南北朝向行列式住宅之间的关系。传统建筑对于屋顶形式的重视与在当前城市中千姿百态、千奇百怪的屋顶设计，并将北京等大型城市空间营造和发展的推动力归结为一种“儒家资本主义”。

但是，熟读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著作的哈森普鲁格显然并不满足于在历史研究中发掘针对中国城市现实的解释，他力图实现的是以符号学视角去解读中国城市发展图景背后所蕴含的深层含义。这种解读方式使得哈森普鲁格能够抵达当前中国城市问题的实质，并提出颇为令人信服的论点，也就是中国城市如何仍然是中国特色的。

他潜在地认为，中国城市特色之所以成立，一方面是传统的文化惯性使然；另一方面，时代的变迁也使得中国城市能够迸发出更多的创造力。中国的规划师能够创造性地将单调枯燥的行列式住宅改进成由流动曲线以及舞动线点所构成的活跃布局，并叠加上层层缩进的空间以及壮丽的小区景

观；中国的建筑师能够在大楼顶部尽情地施展才华，并配之以夜间蓬发的轮廓照明；而中国的景观师则会创造性地融会建筑立面、道路桥梁、景观小品以及媒体立面等各种元素，使之丰富到“令人反胃”的程度。

然而这类戏剧化与符号化的创新并没有令哈森普鲁格这样的西方读者感到舒适，特别是中国城市对于建筑立面美学的漠视，由乌托邦与时尚性所引导的城市发展谋略，以及缺乏想象力的城市设计都与西方城市的特征明显不同。此外，中国城市对于社会公平问题的忽略以及对于奢华之气的追求，从人文主义的角度，也令哈森普鲁格难以适从。

书中令人最为印象深刻的案例分析是上海嘉定的安亭新镇，因为这座新镇所模拟的原型——德国文化名城魏玛——正是哈森普鲁格工作生活多年的地方。但是在这里，他从中感受最多的却是陌生与不相识。

尽管安亭新镇与其他诸如“泰晤士小镇”“荷兰小镇”等冒牌仿制品不同，并且为原汁原味也邀请了德国的规划师与建筑师主持设计，但是在中方合作者的强烈干预与变形下，原先设计中德国城镇围合式的空间被改造为行列式的格局，原先小尺度的街巷被替换成宽阔的马路，原先自由开放的街区被规整为成组的门禁社区，就连原先处在魏玛中心广场的